

③ 访木赖 (节选)

作者 云明 王开江 (原载 1962 年 8 月 27 日一版)

“枫木公社双生岭大队木赖生产队办得不错呀！你们不妨去看看。”我们在屯昌县向很多同志打听哪个生产队办得最好时，他们都首先这样推荐。有些对木赖情况了解较多的人还介绍说：“这个生产队劳动力虽然很少，但无论粮食生产或多种经营都搞得很出色，社员收入水平在全县来说，没有几个生产队能够比得上它；特别是他们干部群众团结一致，人人以队为家的集体主义精神，更是全县的典范。”

的确，最近我们两次访问这个生产队时，也深深为他们热爱集体，勤劳生产的崇高品质所感动。我们先后在这个生产队住了八天，社员们每天都是天还没亮就下田去了，晚上到了上灯时刻还未回来吃晚饭，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误工缺勤。只要稍为注意观察比较一下，你还可以发现这里的社员干活与别的生产队也有很大不同：他们一个人干的活，比别队二个人干的还多，就以养鸭来说吧，过去我们访问过不少生产队，很少看到有一个人营养一百只

鸭的。可是，这个生产队的社员陈如俊、陈如成，每人除负责管养一百多只母鸭外，农忙时还照样参加两刻割稻或犁田；社员陈如锦、陈桂端都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，要是在别的生产队，可能早就算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了，但他们现在除看管二十几头牛外，每天还参加犁园整地等劳动。不仅白天如此，夜里他们干活也不少，如两造收获时的脱粒工作，种稻时的拔秧、送肥等农活，他们都很少占用白天的时间。

这个生产队原是一个土地多、劳力少的小村，全队原有水旱田六十五亩、坡地八十亩，但全、半劳动力总共只有十六个。个体经营时，由于劳动力负担较重，加上分散经营管理不善、力量单薄，因此，很多人虽然不分日夜地死干活干，但往往还是有部分田要误过季节。所以，产量不高，生活很苦。可是，合作化后，特别是公社化后，他们遵循着党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，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，苦干巧干，充分发挥了集体

木赖精神至今仍鼓舞着我们

本报记者 于伟慧

“学大寨，赶木赖”，这是 1960 年代海南农村广泛流传的一句话。当年只有 8 户人家的木赖村，却贡献“爱国粮”8 万斤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成为当时海南、广东乃至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典型。

1962 年 8 月份的《海南日报》刊登了由云明、王开江采写的系列报道《访木赖》(共 3 篇)，文章记述了木赖村村民团结一心搞生产，记述了木赖村优秀共产党员干部舍小家、为大家的奋斗精神。

时隔将近 50 年，记者找到了当时《访木赖》的作者云明，当时写文章时还是一个 30 岁出头的热血青年，如今，老人已经 80 岁高龄，当时的情景他记得也不是很清楚，他女儿慢慢地问，老人慢慢地回忆。

云明说，当时日子特别艰苦，全国各地都在艰苦奋斗，向天向地要生产，木赖在海南可以算上一个典型，他们接到报社的采访通知，就来到木赖村，在里面一直采访了七八天。

在屯昌县城，记者找到了当时木赖村生产队长林爱莲之子黄传交，黄传交讲述道，木赖村人个个能吃苦，母亲更能吃苦，母亲白天到地里干活，晚上还在

制订全村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目标。

当时来村子采访的记者很多，这些记者当时很辛苦，黄传交回忆着说，有的从海口、有的从广东赶过来，吃在村里，住在村里，有的记者还很积极地参与村里劳动。当时《海南日报》登出《访木赖》后，引起了很大反响。生产队第二天找了读报员在全村读报，村里人听到文章，干劲更足了。

屯昌县农业局干部李孝儒当时在木赖村的文艺宣传队，他回忆说，《访木赖》在《海南日报》刊登后，木赖村在全岛都小有名气，村里党员干部和群众干劲很足，成为当时的典型。1964 年，木赖村生产队长林爱莲随县委领导去大寨参观，回来之后，她就下决心，按大寨的模式大干一场。第二年，林爱莲带领村民开始修小水电站，自己发电，带领村民种植橡胶、胡椒、槟榔、水稻、木薯，并规划她心目中的新木赖。

“日干三刻，夜加一班”，是当时劳动最为真实的写照。所谓一刻，就是四个钟头，除此之外，晚上还要加班。

“当时人们心里一心装着劳动，一心想着要听党的

作►品►回►放



作品延伸

木赖村位于屯昌县，提起木赖村，不得不提起该村当年的生产队长林爱莲。正是这位女生产队长，带领全村人走出了一条在当时让众人羡慕的道路。

1968 年，全县开始号召学习木赖村。当时村里的房子都是新的，村里的食堂办得特别好，村民们团结一心、一心向党，坚持农业学大寨，不计个人得失。

那时，在全体社员的心里，林爱莲是一心想着群众的好队长。她三次让房的故事，在 1960 年代的木赖村传为美谈。

作►品►背►后

话。每天早上 3 点半钟就起床，鸡叫就是起床号，下田劳动一直到傍晚六至七点钟，村民们劳动完了回到村里食堂吃饭。吃完饭也是片刻不休，又迅速投入到劳动中。”黄传交回忆，村民们一天要犁田 3 亩多，除了种田种地，还要负责农田改造、开荒辟岭、建小型水利发电站，但很少有人叫苦喊累。

木赖村从 1960 年代就开始走农业集体化道路，生产队统一开饭，统一安排做工。村里还提倡专业养牛，专业种菜，专业种植水稻。这些，都是木赖村成为全国学大寨典型的原因。

1971 年，屯昌县召开党代会，提出了“学大寨 赶木赖”的口号，从此木赖村成为海南、广东的农业示范点。

李孝儒说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《海南日报》当时的报道文章鼓舞了木赖人民的干劲。

时代不断变迁，但是木赖村人在那个年代留下的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团结一心搞生产、抓农田水利建设的那股干劲，以及当年木赖生产队大公无私的女生产队长林爱莲的故事，在村民的心中却刻下了深深的烙印，至今仍鼓舞着他们。

作►品►回►放



作品延伸

展长期热带作物？能不能发展长期热带作物？

争论得最热烈的是在最后召开的一次社员大会上。胡松的话一落音，各种各样的意见就提出来了，什么种长期作物是“只顾长远不顾眼前，只看国家需要不顾本身利益”啦；什么“爷有爷世界，仔有仔世界，为子孙后代造福是说得好听”啦；什么“种长期作物是想一步登天，种得了也管不成，将来会造成两头空”啦，等等，说得个天花乱坠。叫得最凶的是上中农范乙群，他说：“种长期热带作物没那么容易，解放初，我家三个强劳力，苦干三年才种了一百株，现在要种十几万，哪年种得完，种得上也管不了。我们不能干这种傻事。”胡松最后代表党支部总结道：“建设山区要有远大理想，明确目标；有了理想，才有干劲，有了目标，才走得正。种长期热带作物是为了我们大队的长远利益，一定要种；同时，我们也要坚决执行‘长短结合，以短养长’的方针，保证做到三条：一是不丢荒一亩土地；二是收入年年增加，三是粮食产量不减少。”一番话，说得社员们心里乐开了花，石屋大队发展长期热带作物的计划，就在这次社员大会上定下来了。

作►品►背►后

④ 穷乡巨变 (节选)

——记高举开发山区红旗的石屋大队

作者 关欣 吉进智 陈锡香 (原载 1963 年 11 月 27 日一版)

儋县那大公社石屋大队，是一个被誉为“一面开发山区的红旗”的先进大队。

石屋离那大镇不远，十里上下，正好坐落在山区的边沿上。山不高，也不太大，普普通通的样子，单从自然环境看去，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但当你踏上石屋大队的土地之后，却会使你产生一种耳目全新的感觉。那里的山，那里的一切，都强烈地显示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来。你看，那成片成林的热带作物，从山顶披到山脚，从这山坡到那山，当中还间杂着数不清的果木和粮食作物，密密层层，重重叠叠，看不见一片荒废的山岭，找不出一块空闲的土地，一切都是由人们细心打扮过的。那些散落在各个山坑里的水田，晚稻长得绿绒绒的，活象一幅幅镶嵌在山间的锦绣。村落里，一列列新建的瓦房，闪现于万绿丛中。这是一个多么美丽、富饶的山乡啊！

……

石屋虽说离市镇不远，在过去，却是个沉寂荒凉的地方。山上岭上，尽是密密的野林，野兽比人多。这里的农民，就靠着种那山坑里的几片薄田，砍砍柴，烧烧炭，过着十分穷苦的日子。有一首歌词这样说：“有女

莫要嫁石屋，山又荒凉人又穷，一年辛苦无温饱，世代代住茅房。”解放后，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倒了。可是，一座大山——穷山，还是紧紧压迫着石屋的人们。合作化以后，人们曾经在这些山岭上打过主意，搞副业，种香茅，可是，路子没有走正，先想赚钱，结果粮食减产，差点没有饿肚皮。邻近的国营农场年年大开荒，大种热带作物，石屋的人也动过这样的念头，可是有人说：“人家国营农场有钱，有拖拉机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力量小，底子薄，办不了这样的大事。”石屋依然是贫穷山乡。

……

胡松(注：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)一连几个晚上没有合眼，反复地想着公社党委书记的这些话，同时，也想着近来群众中的各种议论。例如，有的人主张不用管什么方针不方针，有钱赚就好；有的人认为种长期作物“远水解不了近渴”，等等。为了讨论开发山区的问题，党支部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。首先是支部会，接着是干部会、社员代表会、社员大会。一谈到今后大队的发展问题，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，争论也非常热烈。争来争去，意见就集中到这两个问题上来：要不要发

石屋报道曾推动海南农业生产

本报记者 孙乐明 特约记者 郭树护

1963 年 11 月 27 日，《海南日报》一版刊发长篇通讯《穷乡巨变——记高举开发山区红旗的石屋大队》，作者是本报记者关欣、吉进智和陈锡香。

记者注意到，当天《海南日报》一版，除另一篇《毛主席接见古巴诗人》的几十字消息，整版就是这篇通讯，还配了 3 幅插图。

当天一版还为此篇通讯配发了编者按，当中写道：“石屋大队的经验，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。”“我们热情地号召大家向石屋大队学习，让石屋精神在我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开花结果。”

近日，记者采访了现年 80 高龄的吉进智老人。他回忆起当时的采写经过，说石屋大队一直是海南农业战线老典型。那次去采访，他们一行 3 人，由农村组组长关欣带队，坐班车到了儋州那大，再骑自行车到石屋。在村里采访好几天，和群众同吃同住，与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松以及当地群众聊天。看到劳动场面

和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，他们确实很受感动，采访结束后，由于村里没有电，他们就住到县委招待所，在那里写完稿，才回报社。

老人说，现在虽然时过境迁，但石屋大队艰苦创业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，永远都值得发扬。那篇报道见报后，石屋的名气更大，影响更广了。

“文革”后，由于报道越来越多，石屋还被称为“南方大寨”，有多国元首和友好国家代表团前来参观，石屋成了全国典型。

《人民日报》也曾对石屋进行报道，并在社论中大篇幅引用石屋群众的话。当时全国小学课本里，甚至有一篇课文叫《石屋大队换新装》。

周恩来总理还曾称赞“石屋是广东学大寨的典型”。

石屋的故事曾被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搬上银幕，在全国播放。

胡松也从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升任那大公社书记、儋县县委副书记、海南行政区党委成员，并成为中共十大、十一大代表，十一大中央候补委员。

记者见到文章主要作者，《海南日报》原总编辑关欣时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，那是特殊的历史，今天要用历史和辩证眼光看待石屋，要以客观的历史观来正确判断和反思“石屋现象”。

关欣说，石屋的精神和事迹，对推动海南农业生产，确实起到积极作用。他同时认为，后来《海南日报》对包产到户和单干的报道，在全国是走在前面的，起到积极推动历史的作用。

关欣表示，中国现在提倡反哺农业，其实早就该这样做。中国的建设事业，是站在农业肩膀上进行的。对石屋典型的反思，其实也可引发对中国“三农”问题的思考。